

毛泽东研究三部曲

李君如 著

毛泽东 与当代中国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研究三部曲

李君如 著

毛泽东 与当代中国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与当代中国/李君如著. —2 版.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4. 12
(毛泽东研究三部曲)

ISBN 978-7-211-06854-8

I. ①毛… II. ①李… III. ①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
IV. ①A84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11573 号

毛泽东与当代中国

MAO ZEDONG YU DANGDAI ZHONGGUO

著 者: 李君如
责任编辑: 李天兵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 政 编 码: 350001
发行部电话: (0591) 87533169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 子 邮 箱: 211@fjpph.com
印 刷: 福州德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7.5
字 数: 387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978-7-211-06854-8
定 价: 8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序

李君如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同我商量，希望再版由《毛泽东与近代中国》《毛泽东与当代中国》《毛泽东与毛泽东后的当代中国》组成的“毛泽东研究三部曲”。犹豫再三，我还是答应了。

之所以要犹豫，是因为这三本书是我在上一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写作、90 年代初期和中期陆续出版的（有的已经再版过，而且多次印刷），现在再版就有一个问题：究竟是保持历史原貌，还是根据新的认识做必要的修改；修改这样已经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著作是否合适。听了许多朋友的意见，考虑到做一定的修订是必要的（为尊重历史，观点性的修订可以加注释说明），最后我还是同意出版社再版。

之所以说修订是必要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原来三部著作是陆续成书的，《毛泽东与当代中国》还写在《毛泽东与近代中国》前，三部书缺少一个总序。因此，这次修订有必要补上一个总序。这就是这篇总序的由来。

我为什么那么重视这篇“总序”？是因为从毛泽东与近代中国，到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再到毛泽东与毛泽东后的当代中国，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条主线。然而，由于原来这三部书是分卷写成的，只能在《毛泽东与近代中国》中提到这一思想是怎么提出的，还无法说明这一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有多么大的意义。所以，非常有必要补上这一点。与此同时，我们也确实需要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理论时，从基础做起，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提出和发展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是毛泽东认真总结中国革命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并进行深入的哲学和理论思考的基础上提出的；在改革开放新的实践基础上，在21世纪初，我们把这一命题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的中心任务重新提了出来。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提出的。

1938年10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长篇报告。在这一著名报告的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他以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经历的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初期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出现的右倾错误为鉴戒，深刻地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①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全委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

^① 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第65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务，并强调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成果。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报告中论述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的时候，明确指出：毛泽东“成功地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工作”。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形成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抗日战争初期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是因为中国革命的实践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理论武器，但是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从中国革命的实际进程来考察，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形成及其这一命题提出的过程，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近代中国落后挨打、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激发了无数志士仁人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但是，从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洪秀全领导的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运动，到康有为、梁启超推动的戊戌变法，都没有获得成功。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尽管结束了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并没有改变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逐步形成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革命的成果最终还落到了北洋军阀手中，国家和人民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具有“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志向。为了救亡图存，他和同时代的许多爱国青年一样，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呐喊中突破中国封建文化的藩篱，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应该讲，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有不足，还存在着毛泽东后来在《反对党八股》中所说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即“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等形式主义问题。但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世界上各种思潮汹涌澎湃

地进入中国，毛泽东的思想认识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实现了一次又一次超越。在哲学思想上，他经历了从“无我论”到“唯我论”特别是“精神之个人主义”，到“平民主义”，再到唯物史观的转变；在政治思想上，他经历了从传统的爱国主义到民主主义特别是无政府主义，再到共产主义的转变。毛泽东经历的这一系列思想转变，不是在书斋里发生的，而是在他亲身经历的实践推动下发生的，即在他参与和领导的思想启蒙运动、驱张运动、湖南自治运动等一系列民主主义实践遭受失败以后发生的，所以他的思想转变要比别人更为深刻。^①他最终接受或选择马克思主义，表明他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思想武器。而这一点，正是他后来形成并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

第二阶段，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马克思主义“本本”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毛泽东和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创建中国共产党，是因为他们在实践中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代表被剥削被压迫的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但是，实践告诉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于西方社会并以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为主要任务的马克思主义，要运用于中国社会环境，还必须根据中国实际提出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的战略思想和方针政策。为此，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形成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团结广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买办资本主义的战略策略思想；在大革命失败后，又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思想并带领秋收起义队伍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独特革命道路；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中，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提出了解决农村土地问题、红色政权建立问题、人民军队建设和

^① 毛泽东说：“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参见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1921年1月1日、2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1—3页，人民出版社，1993。

党的建设等一系列新问题。在此基础上，他在1930年针对党的工作指导中出现的主观主义倾向，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要形成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等一系列重要思想。毛泽东这些关于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思想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形成的重要环节。^①

第三阶段，在历史经验和哲学思想的总结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经过长征和遵义会议的生死考验，毛泽东在红军到达陕北以后，一方面总结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实践论》、《矛盾论》等讲义，着手在红军指战员中进行党的历史经验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教育；另一方面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国内民族矛盾取代阶级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特点，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路线，并以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了共产党要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正当毛泽东在进行这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工作的时候，1937年11月，王明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领导身份回国，并在中央政治局12月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提出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指示，批评了毛泽东关于党要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自主的主张。1938年，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当时主持共产国际工作的季米特洛夫了解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后，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国，指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根据这一重要指示，中国共产党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②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著名报告，强调党要加强学习，要研究理论、历史和现实，包括要研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任务。

^①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9—118页，人民出版社，1991。

^② 《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第504—52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也为全党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1942年的延安整风，1945年胜利召开的中共七大，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指导下取得成功的。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成果。研究“毛泽东与近代中国”，毛泽东在推进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中之所以能够取得那么辉煌的成就，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赢得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胜利，靠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新提出

但是，在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很少公开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一般只是使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提法。

研究者注意到，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过一件重要的事情，与此有关系。这就是，1948年6月共产党情报局通过决议，批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所谓民族主义、反苏和亲资本主义倾向。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在准备夺取全国政权，很重视共产党情报局的决议，专门做了学习贯彻的决定，并且发表了社论，还把这些文件和社论列为中央党校学习的文献。考虑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可能会被误解为民族主义倾向，那以后，党中央在公开场合不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来在《毛泽东选集》出版时，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①。

即使如此，后来在中苏论战的时候，苏共还是对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使用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进行了指责。1960年11月初，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苏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同中国音乐协会负责人谈话时，说过在艺术上要学习西方好的东西，但是“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参见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2页，人民出版社，1999。

中共中央在送交中共代表团给中共中央的长篇《答复信》中，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指责，其中之一就是：“马列主义是一个国际主义的学说，它对一切国家都同样是适用和可以采纳的。然而中共的同志们，中国的报刊，竟广泛地使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譬如说，刘少奇同志在中共七大的报告中，就说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说毛泽东同志‘成功地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工作’。”因此，毛泽东在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对此作了回应。他风趣地说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恐怕不是你（指刘少奇）的专有权，我想我也讲过嘛！文字上有，我记得好像有，六中全会上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记得我提过，所以发生这个版权问题。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一个普遍一个具体，两个东西的统一叫中国化。”

实践证明，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是正确的。研究“毛泽东与当代中国”，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靠的依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犯错误，甚至发生了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错误，也是因为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即在“毛泽东后的当代中国”，邓小平在认真总结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探索并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并以社会主义的崭新实践验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性。由邓小平创立，并由江泽民推进到21世纪、胡锦涛在新世纪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继续坚持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继毛泽东思想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成果，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进入21世纪之初，中国共产党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重新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提法。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重要讲话

中，首次用“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来说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同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中共十六大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经常使用的提法。2003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通知中，强调这一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胡锦涛在2003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同年12月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上的重要讲话、2005年1月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的重要讲话、2006年8月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重要讲话、同年10月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以及其他一系列重要活动的重要讲话中，多次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2006年5月31日，胡锦涛在为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所写的序言中，明确提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作为中心内容，着力引导广大干部准确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成果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并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特别是，2007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继1945年中共七大后，再一次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写进了党代会报告，提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体会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过程中，贯串着一条鲜明的主线，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历史的回顾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全新的命题。这

一命题的提出，不仅在中国是一个理论创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也是一个理论创新。因此，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应该深入地研究这一命题的科学内涵。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和理论要求

什么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呢？

这个问题当年在延安曾经引起人们广泛的兴趣。事实上，在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之前，当年已有盛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就已经在1938年4月提出过“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①。1940年2月，他还针对叶青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名，鼓吹“中国国情特殊”，用复古主义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言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驳。^②

根据毛泽东在《实践论》《矛盾论》中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特别是他从《反对本本主义》开始到延安时期反复强调的，关于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科学论述，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回答的是在中国应该“怎么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的理论问题。因此，它首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原则，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对党的理论工作的要求。

这里，有必要区分一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概念。前者指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理论工作中必须坚持的原则和要求，后者指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获得的理论成果。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理论工作中必须坚持的原则和要求，

^① 艾思奇：《哲学的现状和任务》。《艾思奇全书》第2卷，第491页，人民出版社，2006。

^② 艾思奇：《论中国的特殊性》。《艾思奇全书》第2卷，第772—779页，人民出版社，2006。

包括了一个基本原则、三个理论要求：

一个基本原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用当时的话来说，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也就是不能抽象地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论新阶段》（1938年）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明确提出这一问题后，在《〈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中，进一步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及其对党的成熟程度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强调党要努力学习，研究理论，研究历史，研究现实，在这样三方面的学习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在《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这篇著名的整风文献中，毛泽东在阐述“理论联系实际”的“实事求是”原则时，指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必须做到理论与历史、现实相结合，也就是说理论与此结合的“实际”包括“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两个方面。在这里，毫无疑问，“现实状况”的研究是最重要的。不研究现实问题，不解决现实问题，就谈不上理论联系实际，就不可能实事求是，就无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此同时，“历史经验”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现实问题时，特别重视联系更广更深的历史经验来研究现实运动的规律。这里所讲的“历史经验”，包括中国的，也包括外国的；包括中国现代的，也包括中国古代的。实际上，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古今中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来认识现实并解决现实问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艰苦的理论研究过程，是理论与包括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的客观实际之间相结合的复杂过程。

三个理论要求，就是：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包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进而研究总结中国现实社会的矛盾运动规律；二要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丰富经验，并在同外国经验的深刻比较中使之上升为理论，充实到马克思主义理论

体系中去，即毛泽东所说的“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①；三要通过民族形式包括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来表达马克思主义，不仅在内容上要努力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形式上也要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把这三个理论要求与基本原则统一起来，我们可以注意到两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之间双向互动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也是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的过程。究其实质，是马克思主义面对中国实际，回答和解决中国实践提出的问题的过程，是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这里，理论要面对中国现实，指导中国实践；同时要深入实践而不能脱离实践，回答和解决实践中提出的问题；还要在实践中敢于和善于进行理论概括、理论创新。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历史经验总结与现实矛盾研究之间双向互动的过程。不研究现实矛盾不可能实事求是，不研究历史经验也不可能实事求是。只有把对现实矛盾的研究与对古今中外历史经验的研究结合起来，才有可能认识并揭示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规律，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异端”问题

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思考的过程中，有一种观点值得重视。这就是，要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所谓“异端”。

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许多创新的理论观点都曾经被看作是“异端”。这种情况，在思想史上具有某种普遍

^① 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4页，人民出版社，1993。

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过程中进行实践探索和实践创新、理论探索 and 理论创新的过程，对于在实践中形成的新经验和新观点也有一个需要以实践为基础进行再认识、以实践为标准进行客观检验的过程。在这个探索和创新过程中，难免会发生一系列新旧观点的分歧、对立和冲撞，难免会有一些新经验新观点被看作是正统理论的“异端”。比如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和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的思想，邓小平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江泽民关于共产党要坚持“三个代表”和新的社会阶层的优秀分子也可以入党的思想，等等，都曾经被所谓正统的理论视作马克思主义的“异端”。邓小平在谈到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说过：“这次经济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①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出现过，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也发生过，因此它不是一个你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一个在实践和理论探索、创新过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问题。所以，在理论创新过程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必须解放思想，正确对待所谓的“异端”。

正确对待“异端”，就是要正确对待新观点。问题是，并不是什么新观点都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曾经提出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说这一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新阶段。实践证明，这一理论是完全错误的。正因为是这样，就有一个正确认识“异端”、正确认识新观点的问题。我们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看一看人们提出的各种新观点，究竟有哪一些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在实践中是有成效的，是正确的。当然，这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检验

^① 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1页，人民出版社，1993。

出来的，要经过长期的实践、长期的观察、长期的检验，才能够认识其真伪对错。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民族主义、多元化

考虑到自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来以后，曾经有过各种错误的解读，因此有必要对其中一些有重大影响的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民族主义

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前面所介绍的，中国共产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是为了避免被苏共误解中国共产党具有民族主义的倾向。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民族主义是一个多义词。有时候，人们把民族主义等同于爱国主义；有时候，人们把民族主义看作是以民族利益为中心并且狭隘地维护民族利益，没有国际责任，甚至不惜侵犯其他民族利益的思潮。对于后者，我们又常常称它为“狭隘民族主义”。由于这种情况的复杂性，为避免误解，中国共产党很少在褒义的意义上使用“民族主义”这个词。当年，共产党情报局批评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又是一种情况，即认为他们常常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同苏共不一致。显然，他们并没有能够正确地区分不同的民族主义。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处理重大问题，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发展。毛泽东在领导革命的时候，经常强调要把我们的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统一起来，就是这个意思。在我们强调国际主义的时候，苏共并没有意见；在我们突出爱国主义的时候，他们总认为我们是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不能

因为人家怀疑我们是这种民族主义就放弃爱国主义的旗帜，我们也不能因为强调爱国主义而纵容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这是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和牢记的。

同时，我们要认识到，爱国主义也是历史范畴。毛泽东说过：“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①同样是我们倡导的爱国主义，在民族危亡的时候，救亡是爱国主义的主题；在今天，爱国主义的主题是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因此，我们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同我们民族肩负的历史任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多元化

这个问题，与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后发生的一场争论有关。

长期以来，我们认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就是标准的社会主义。在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弊端日益暴露的过程中，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包括社会主义是不是只能有苏联一种模式。邓小平提出要“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在社会主义发展史对这个问题的一個重大突破。1983年，在南斯拉夫的察夫塔特召开的世界社会主义圆桌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作了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报告，引起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但也遭到了苏联的抨击，指责这是搞社会主义多元化。但是，经过深入思考，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1985年召开的世界社会主义圆桌会议上，一些专家指出：“每个国家都有权以自己的特定方式去发展社会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0页，人民出版社，1991。